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重审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

——伊格尔顿与威廉斯的理论交锋与思想遗产

陈文旭 彭 若

[摘要]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特里·伊格尔顿与雷蒙德·威廉斯在《新左翼评论》上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统性问题展开了辩论。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的以历史语义学为基础的文化唯物主义具有改良主义、唯心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原则与革命性。威廉斯对伊格尔顿的批评作出了回应,他一方面捍卫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指责伊格尔顿陷入了脱离现实语境的“形式主义”,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内在可译性”这一核心机制回应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这场辩论的实质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他们的观点分歧构成了日常文化建构与激进政治决裂之间的创造性对话。这场辩论不仅涉及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而且深刻揭示了文化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为当代左翼理论思潮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

[关键词] 英国马克思主义; 正统马克思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 威廉斯; 伊格尔顿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6]02-0082-08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方社会深陷经济滞胀、政治失信与文化权威崩塌等多重危机之中,暴露出原有理论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面对阶级结构变化、身份斗争兴起的挑战,传统理论范式难以有效解释现实问题,因而激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及其文化和政治功能的新一轮批判性反思。在这一背景下,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1943—)与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国内学术界一般译为雷蒙德·威廉斯,也有的译为雷蒙·威廉斯。本文正文中使用威廉斯,在脚注中遵从原著的译法)先后在《新左翼评论》上发表《批判与政治:雷蒙德·威廉斯的工作》(“Criticism and Politics: The Work of Raymond Williams”)与《1945年以来英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Notes on Marxism in Britain Since 1945”)两篇文章,就何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其正统性以及批判理论应以何种方式介入现实政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辩论。这场辩论的实质是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空间内的范式碰撞,关乎文化是否以及如何承担解放使命的根本问题。全面准确揭示这一辩论的内在逻辑,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文化的政治性以及批判的现实性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深入反思当代左翼理论策略提供了历史和理论基础。

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论重构

要理解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批判,必须首先厘清威廉斯理论方案的核心及其思想渊源。威廉斯的理论建构始于一个根本性问题:何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一问题意识直接源于他对第二国际及

作者简介:陈文旭,男,法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彭 若,女,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1LLMLB076)的阶段性成果。

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不满。

第二国际时期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贬低为“纯粹的历史科学和经验科学”，在将经济关系指认为唯一决定性因素的同时，否定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致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革命的批判的本质被严重削弱。针对这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理解，卢卡奇在《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1919年）中明确提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成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是指方法。”^①也就是说，按照卢卡奇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并不是其特定理论观点而是其辩证方法，只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才能真正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这一从方法论意义上阐释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

在卢卡奇的基础上，威廉斯进一步将这种辩证方法具体贯彻到文化分析领域。在与苏联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中威廉斯认识到：“不仅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阐释过去和现在的文化，而且也要用马克思主义预测未来的文化。”^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将目光投向了语言领域，将语义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脉络中，打破了传统语言学的封闭性。在威廉斯看来，语义的变迁绝非单纯的语言学现象，而是深层社会历史斗争的记录与场域。他明确指出，许多关键术语不仅是亟待分析的疑难，而且是尚未解决的历史运动。这就意味着不能仅仅将“文化”“阶级”“民主”“革命”等词汇的意义模糊与冲突当作逻辑上的不连贯而从理论上予以“解决”，更要看到它们本身就是正在进行的一系列历史斗争的内在构成因素。关键术语意义的不稳定性是社会关系动态发展的直接体现。

基于此，威廉斯指出了语言的两个特性，即实践性与能动性。一方面，语言并不是纯粹的思想或经验，而是实践意识，从一开始就与人类所有其他的社会活动存在密切关联，是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感知和回应世界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语言具有能动性，“语言就是这种能动的、变化着的经验的接合表述（the articulation），就是一种充满能动活力的、接合表述出来而显现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在场（social presence）”^③。“接合表述”是一个兼具“表达”和“连接”之意的复合概念，表明语言既“表达”了社会经验，又“连接”并塑造了社会关系。语言是一个斗争与协商的场域，不同的社会力量都试图在其中“接合”（赋予、争夺）对自己有利的意义。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威廉斯实践了这一方法，他试图阐明语言系统承载着的社会历史演变轨迹。追溯“文化”一词的意义，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文明史的批判，是浪漫主义对功利主义的反抗，是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发展成果的梳理。每一个关键词的语义流变都是一部浓缩的、未完成的社会斗争史。

威廉斯将历史语义分析创造性地运用于文化与社会批判，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对文化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重构。

首先，威廉斯认为，文化并非抽象的观念，而是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和物质实践，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发挥着构成性作用。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详细追溯了英国文化主义传统中文化观念的历史沿革后指出：“文化不仅仅是智性和想象力的作品，从根本上说文化还是一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④文化观念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反映，其本质是把文化和人的社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在威廉斯这里，文化不再是一种观念形态，而是一种构成和改变现实的主要方式，在改造现实世界中发挥着能动作用。在此基础上，威廉斯把文化理论研究定义为“对整体生活方式中各因素之间

①[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48页。

②乔瑞金、任新元：《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变革思想的方法论意义探析》，《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③[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9页。

④[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57页。

的关系所作的研究”^①。因此,“对文化进行分析,是试图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的综合体的组织的性质。在这个语境中分析某些特定的作品或制度,也就是要分析它们基本的组织类型,分析构成整体组织各个部分的这些作品或制度所体现的各种关系”^②。这意味着文化不再是次要的、被决定的,而是基本的、构成性的社会物质过程,这为文化唯物主义提供了一个合法化的研究对象。

其次,威廉斯反对经济决定论,将“决定”阐释为“设定界限和施加压力”,而非绝对控制,从而为文化实践的能动性留出了发挥作用的空间。威廉斯认为:“在主流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通常一直被当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③他进一步指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阐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时使用的“决定”(determine)一词,实则是对马克思原意的误读与曲解。这一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概念并非出自马克思本人,也无法体现他对社会结构关系的辩证理解。当然,威廉斯并未因此否定经济基础所具有的结构作用。作为一种理论策略,他选择保留“决定”这一术语,但对其内涵进行关键性重构,即不再将其理解为某种内容被预告、被预示或被控制的绝对因果关系,而是将其界定为“设定界限、施加压力”的动态过程。语义斗争的场域与范围正是在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所设定的界限与压力之下形成的。正如一个时代对“民主”的理解,其可能的意义边界始终被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框定,既非无限可能,也非全然命定。威廉斯在承认经济基础首要性的前提下,为文化的能动性开辟出充分的理论空间,坚持了辩证的方法论。

最后,威廉斯强调“感觉结构”这一概念,指出理论必须扎根于人们活生生的经验和语言实践,以避免脱离现实的抽象空转。他将“感觉结构”定义为“溶解流动中的社会经验”^④,认为它体现的是特定时期不断变化着的传统、习俗、机制等社会因素与文化、思想、艺术、情感、信仰等事物之间的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呈现出一幅在场的、不断变化生成中的图景。这一定义表明,经验并非个体所有,而是由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和确认并随实践不断变动的“共同经验”。“人们的心灵是由他们整体的经验所塑造的,没有这种经验的确认,即使是最为巧妙的资料传输也无法完成传播。”^⑤因此,通过分析一个时代的“感觉结构”,研究者就能够捕捉到那些尚未被明确表达的、正在形成中的共同体验和社会关系。这正是威廉斯在实践中重构的马克思主义,即一种必须从具体社会存在出发,而非从抽象的理论教条出发的历史分析方法。

对威廉斯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不在于固守某些特定的结论或模型,而在于坚持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这就要求理论家必须成为“历史语义学家”,去把握反映在语言中的历史运动,去参与意义形成的社会斗争,从而使其理论能够真正扎根于尚未解决的历史问题之中,而非凌驾于其上。真正的正统是方法的正统,是理论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自我更新的勇气。正是威廉斯的这一理论方案,构成了伊格尔顿后续批判的对象。

二、伊格尔顿对威廉斯文化理论的意识形态批判

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批判有一个明确的理论前提,即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在于其坚持经济生产方式的最终决定作用、阶级斗争的核心地位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伊格尔顿尽管肯定了威廉斯批判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意义,但认为其对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重构存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偏差。

首先,伊格尔顿尖锐地指出威廉斯理论中潜藏着改良主义倾向。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对作为整

①[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②[英]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

③[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

④[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⑤[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高晓玲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44页。

体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强调,以及对内在的、漫长的革命的信念,淡化乃至消解了阶级斗争的尖锐性、断裂性和必要性。这种理论倾向于寻求文化领域的渐进变革,将希望寄托于意识的缓慢演变,而非指向彻底推翻经济基础的政治革命。具体来说,威廉斯坚持认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创造的“新的意义和价值观”,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自然地延伸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活动中。这种观点建立在对民众创造力的信任的基础上,将复杂的社会变革简化为文化价值的渐进积累。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将革命性要求转化为对现状的描述性表达,实质上消解了社会主义革命所需要的断裂性与彻底性。伊格尔顿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改良主义倾向在理论建构上的具体体现。他指出,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通过提取“社会主义人文主义”中的激进要素,如传统、共同体、有机组织、成长、整体性等,并将其与劳工主义话语相结合,从而“将劳工运动的改良主义神圣化,把它上升为道德和文化合理性的高度,并主要从最具根深蒂固的政治反应传统中为其描绘价值和象征的含义”。^①这使得《文化与社会:1780—1950》实际上成了一个理想主义和学院派的规划,而非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方案。

其次,伊格尔顿批评威廉斯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倾向。伊格尔顿指出,威廉斯将各种富有生机的实践模式、社会关系、伦理观念及政治审美意识形态杂糅到一起,并融入一种空洞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抽象的文化概念之中。“这样一种融合不仅废除了任何实际上的优先权的等级性,将社会形态削弱成一种‘循环的’黑格尔派的整体性,并在萌芽时期就将其政治策略击溃,然而又不可避免地让那种社会形态过于主观化。”^②也就是说,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通过将多样、异质的社会实践要素不加区分地统合进一个高度抽象的文化范畴之中,磨平了文化概念的批判性锋芒,消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精确性与政治针对性。此外,伊格尔顿还指出,威廉斯对经验的绝对信任,导致其忽视了意识形态系统地塑造和扭曲人的经验。这种对经验的前意识形态性的天真信任,在伊格尔顿看来就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它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正如阿尔都塞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把个体唤问为主体”^③,使其误以为自己是意义的中心来源,从而遮蔽了真正决定主体性的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遵循这一理路,伊格尔顿指出,威廉斯对经验范畴的依赖,导致其在认识论上落入了意识形态的陷阱,正是因为他未加反思地接受了经验的自明性与真实性,所以未能对经验本身得以形成的历史条件与意识形态机制展开批判性考察。

最后,伊格尔顿从“共同文化”这一概念出发具体批判了威廉斯的民粹主义倾向。“威廉斯在一种‘共同文化’需求方面的信仰还是不断与对它的当前现实的主张相互交叉和混淆的。”^④威廉斯一方面将“共同文化”视为需要努力实现的理想,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它已经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现实存在。这种混淆使得他的理论陷入一个悖论,即既要以“共同文化”为武器抵抗霸权文化,又不得不否认这一霸权的实际效力,因为承认霸权的强大影响力就意味着否定普通大众是意义与价值的真正创造者。在伊格尔顿看来,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威廉斯的社会形态观念“过于主观化”,其理论深处仍残存着民粹主义的思维定式。威廉斯这一思维倾向深受劳伦斯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为对情感与理智整体性的执着追求,而这种整体性概念屡屡悄然转化为社会理论中的有机主义隐喻。“仿佛社会——‘普通男人和女人’——是价值和思想具体化了的的感觉主体——观念的充分有效性取决于他们追溯具体存在的直接参照以及感性生命的直觉所在。”^⑤伊格尔顿的批判直指威廉斯民粹主义立场的根本困境:当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被简化为人民与霸权的二元对立时,理论不仅失去了分析现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49页。

②[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50页。

③[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71页。

④[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53页。

⑤[英]特里·伊格尔顿:《批评与意识形态》,段吉方、穆宝清译,北京出版社2021年版,第60页。

实的能力,而且在将人民浪漫化的过程中背离了民众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复杂经验与斗争实践。

伊格尔顿的上述批评建立在关于“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明确预设之上,即马克思主义与劳工主义或改良主义的纯粹对立和经济因素的首要性。首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与劳工主义或改良主义是“纯粹对立的”,是旗帜鲜明的革命政治。其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在经济基础尚不够发达、不能提供足够的物质剩余的状态下,文化只能受制于上层建筑,发挥意识形态支持者的功能”^①。伊格尔顿认为,威廉斯通过赋予上层建筑基础性的特性,从而消除了上层建筑的第二性特征,以及拒绝走向庸俗马克思主义,使得威廉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成了一个待解的疑问。伊格尔顿将威廉斯的意图总结为如下悖论,即“只有通过经济,文化才能超越经济”,并批评这只是一沉溺于自我安慰的、虚伪而自负的臆想。

通过上述一系列批判,伊格尔顿划清了与威廉斯的理论界限,指出真正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必须是科学的、批判的,不能止步于描述大众文化,而必须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剖析其内在的意识形态矛盾,揭示文化实践与阶级斗争、经济结构的内在关联。唯有如此,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核和革命性品格。

三、威廉斯对马克思主义“内在可译性”的理论辩护

对于伊格尔顿的尖锐批评,威廉斯在《新左翼评论》上作出了有力回应,有条不紊地回应了所有关键指控,并在此基础上夺回了理论阐释的主动权。

威廉斯首先重新界定了争论的核心——何谓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含义,与其说是取决于思想史(这在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中仍是定义它的惯常方式),不如说是取决于实际社会存在和意识的复杂发展。”^②这也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此框架下,威廉斯指认伊格尔顿的批评带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体现了用“一种纯粹的(因而往往是未定义的)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来衡量一切的论辩习惯”^③。

威廉斯对伊格尔顿的批评集中于其形式主义的思想理论倾向。他认为,伊格尔顿所代表的阿尔都塞主义模式沉迷于理论自身的复杂构型,脱离了活生生的、具体的社会斗争和历史运动,成了一种新的经院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恰恰成了威廉斯所批判的那种“合法化理论”与“学术理论”的典型代表:他要么退守至已被历史扬弃的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自身对某种教条化正统的合法继承;要么将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个封闭的学术文本的体系,试图以形式主义方式在理论层面“解决”政治问题。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理论姿态在最糟糕的情形下,将导致一种自我疏离的政治无力感,“我们在现实政治中就像一个旁观者,与身处其中的混乱政治只有微不足道或言辞上的联系”^④。正如汤普森坚决反对将阶级视为一个静态的结构,他强调阶级是一个发生在具体历史时间中的动态过程,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⑤。威廉斯认为,理论如果不能扎根于人民具体的、物质的生活经验,就会丧失其解释力和变革现实的能量。伊格尔顿的形式主义不仅因其对整个阶级的抽象贬低而站不住脚,而且因其与当代现实政治完全脱节而成为空中楼阁。

针对伊格尔顿将自己指认为民粹主义的观点,威廉斯采取了概念重夺的策略。威廉斯首先强调,与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一样,民粹主义的含义绝非固定不变,其价值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和政治

①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哲学动态》2014年第9期。

②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46.

③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p. 238-239.

④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38.

⑤[英]E. 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语境。在进步语境中,它可以代表一种民主的、来自底层的政治动员力量,一种对精英主义政治和文化的拒绝。威廉斯说:“我从来都不是那种残余的民粹主义者。但由于我把这个过程视为压力之下的选择,并且知道压力的来源,所以我无法转向另一种普遍可用的立场:对人民的蔑视……这使得包括整个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民众仅仅成为一种腐败意识形态结构的载体。”^①也就是说,威廉斯既不认同那种浪漫化的“残余民粹主义”,也坚决反对蔑视人民的精英主义立场。他强调,民众的文化实践始终是在社会压力之下作出的选择,而这一压力的来源正是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不过,威廉斯所理解的“决定”并非机械的全然压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设定限制”与“施加压力”,在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力量发生实际的相互作用中,这种“决定”有可能迸发出一种渴望人类解放的缓慢冲动。由此,威廉斯将伊格尔顿给自己贴上的民粹主义标签,从意识形态指控转化为如何历史地、辩证地理解文化政治动力的问题,从而在拒绝精英主义蔑视的同时,坚持了文化唯物主义关于限制与能动相互交织的核心主张。

威廉斯为自己的改良主义作了辩护。他认为,在实用主义的层面上,改良主义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构成要素,尤其是因为“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如果不能回应和代表工人阶级切身感知的那些利益(往往是短期的),就会变得被认为是无能的”^②。而伊格尔顿所倡导的革命策略,在威廉斯看来,存在盲目套用俄国革命模式的严重问题——该模式仅适用于“那些制度的社会和政治防御能力弱得多的社会”^③。这导致其革命策略单纯依赖资本主义制度的自行崩溃,并试图将此种危机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威廉斯指出,伊格尔顿忽视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复杂阶级结构,这种结构构成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强大支柱,使得单纯呼吁全面革命不仅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沦为一种政治上的“恐怖主义”。威廉斯强调:“现在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危险:某种机会主义理论中利用对‘改良主义’的批判,鼓动孤立的激进派进入战斗,并进一步演变为政治、经济及准军事行动。而他们最终不得不仓促接受一个整体性替代方案。”^④威廉斯由此指出,真正的左翼策略必须立足具体社会形态与现实阶级状况,而非陷入脱离历史条件的革命浪漫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中,漠视改良的阶段价值,往往意味着背离工人阶级的真实斗争,并可能导向一种空洞而危险的政治激进姿态。

威廉斯的回应的核心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内在可译性”。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固守某种纯粹的理论本质,而在于其能够随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具体发展而不断地“翻译”和更新自身。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要研究精神生产[IX—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⑤。这种理论取向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不断变化的现实社会中来考察,使其始终保持与政治实践的内在联系。威廉斯指出:“利用现有资源;学习并尽可能地传授新的资源;在压力下直面矛盾和选择,这样就有机会去理解并引导它们走向另一个方向,而非一味谴责或否定。”^⑥从这一视角来看,形式主义是一种思想的虚无,它们既没能吸收和处理政治现实的压力,也没有在此过程中将其转化为积极的政治潜力。

通过上述一系列回应,威廉斯不仅驳斥了伊格尔顿的指控,更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一种不同于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径——扎根于社会现实、致力于理解并介入社会变革的文化唯物主义方案。这场理论交锋既凸显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性的深刻分歧,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①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41.

②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47.

③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48.

④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49.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⑥参见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Materialism*, London: Verso, 2005, p. 241.

四、关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争论的当代启示

伊格尔顿与威廉斯争论的根源在于二者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范畴的理解存在根本性分歧。威廉斯将实践视为一种发生于日常文化领域的、持续的创造性活动,而伊格尔顿则强调实践是旨在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结构的激进政治行动。这一分歧的哲学基础可追溯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强调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感性活动并将现实理解为“感性的人的活动”^①,指出哲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改变世界”^②。威廉斯发扬了前者,发展了一种日常的、持续的文化实践观,他主张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实践形式,是“整体的生活方式”,强调社会变革蕴藏于大众的日常经验、语言与价值协商之中。伊格尔顿则坚持后者,秉持一种激进的、断裂的政治实践观,强调实践的根本使命在于彻底颠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指认威廉斯的路径容易沦为对体系的适应。因此,二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根本对立,而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对于实践与革命的不同理解,是一种介于日常文化建构与激进政治决裂之间的创造性对话。

威廉斯与伊格尔顿的这场争论,不仅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内部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两种范式之间的张力,而且从文化政治的构建、理论正统性的重思与主体观念的重塑三个维度,为当代左翼理论提供了能够持续发挥作用的思想资源。

一是在日常性与革命性之间重构文化政治。当代左翼不能只关注宏大的革命叙事,而忽视生产意义和形塑主体的文化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资源 and 动力蕴藏在大众日常的语言、消费、情感和价值协商之中,脱离上述广泛领域的理论策略容易沦为空洞的先锋主义。但是如果完全沉溺于日常性和文化描述,缺乏对资本结构的整体性批判和对意识形态本质的彻底揭露,那么就可能丧失革命动能,最终被资本主义收编为“抵抗的装饰”。正如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的,当代的左翼斗争必须是多维的,“凭借将再分配和承认解释为两种互相不能简约的正义维度,它把正义的通常理解拓展到包含主体间以及客体的思考”^③。她批评主流身份政治和文化主义往往局限于承认斗争,但忽视对经济结构的批判,而传统的经济还原论则无法解释和整合基于性别、种族、生态等文化身份的日常斗争。因此,当代左翼既需要开展深入日常经验的文化斗争,又必须在关键时刻保持理论批判和政治决断的能力。

二是在分析方法与规范内容之间重思理论正统性。威廉斯将正统性定义为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方法,而非特定结论。理论必须随着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发展不断地“翻译”和更新自身,由此保持其介入现实政治的能力。伊格尔顿则强调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在于其科学的批判的本质和颠覆性,反对因过度语境化而稀释其革命性规范内容。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接合”理论为缓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工具,他指出,意识形态与阶级之间、理论与政治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永恒的决定关系,其连接是历史性和暂时性的“接合”。^④这种连接始终处于流动的、未完成的状态,意味着社会现实既非由纯粹的经验构成,也非由封闭的结构完全决定,而是一个各种力量不断进行斗争与协商的动态场域。基于此,理论必须始终“在没有担保的情况下思考”,拒绝将任何既定的结论视为普遍公式,是通过对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具体的历史分析,在动态发展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和实践指南的功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页。

③[美]南茜·弗雷泽、[德]阿克塞尔·霍耐特:《再分配,还是承认?——一个政治哲学对话》,周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页。

④参见Lawrence Grossberg,“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 10, No. 2 (1986), p. 53.

三是在经验与结构之间重塑主体观念。威廉斯强调从民众生动的经验出发,强调文化实践中蕴含的解放潜力,反对精英主义对大众文化的蔑视。伊格尔顿则始终对经验保持警惕,他强调经验本身可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若不对其进行批判性审视,可能会遮蔽其背后真实的权力关系,他同时认为,真正的解放必须通过理论批判强化自觉的阶级意识,而非停留在经验的自发性层面。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的“感性的分配”(Le partage du sensible)^①理论为此提供了分析工具。朗西埃分析了权力如何通过界定“可见、可听、可说”的范围来塑造共同体验,即人们感知世界的框架本身是被政治预先安排的。也就是说,经验既非纯粹自发的,也非完全被决定的,而是在特定的感知体制中被形塑的。因此,左翼理论家们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够穿透经验表象的分析方法,既能理解民众的情感与诉求,将其作为斗争的起点,又能批判性地揭示经验如何被资本、性别、种族等权力结构所形塑,从而引导自发情绪走向自觉的政治行动。

伊格尔顿与威廉斯辩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它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不可逾越的视域”的内在丰富性。这场辩论促使我们超越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简单对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恰恰源自其方法的辩证性与历史性,即正统性不在于固守特定结论,而在于保持对历史和现实的动态阐释能力。面对当代左翼理论与实践的困境,我们无需在威廉斯与伊格尔顿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应批判地继承他们留下的遗产。这就意味着要在发展微观政治、身份政治等新型斗争形式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整体性批判;在尊重多元经验和地方性知识的同时,不放弃普遍解放的规范视野。唯有如此,左翼才能在保持理论锐度的同时,获得改造现实的政治影响力,最终实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辩证统一。

Re-Examining the Orthodoxy of Marxism—Theoretical Confrontation and Intellectual Legacy between Eagleton and Williams

Chen Wenxu, Peng Ruo

Abstract: In the 1970s, Terry Eagleton and Raymond Williams engaged in a significant debate on the theoretical orthodoxy of Marxism in *New Left Review*. Eagleton criticized Williams' cultural materialism, which was based on historical semantics, for its reformist, idealist, and populist tendencies, arguing that it weakened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the inherent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Marxism. Williams responded directly to these criticisms: on the one hand, he defended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materialism; on the other hand, he accused Eagleton of falling into a kind of “formalism” divorced from the actual context, and emphasized that Marxism must respond to changes i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rough the core mechanism of “internal translatability.” The essence of their debate lies in their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of the Marxist category of practice. Such differences constituted a crea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 construction of daily culture and radical political rupture. The debate between Eagleton and Williams not only concerns the understanding of orthodox Marxism, but also profoundly reveals the tension between cultural theory and political practice, providing important theoretical enlightenment for contemporary left-wing theory.

Key words: British Marxism; orthodox Marxism; cultural materialism; Raymond Williams; Terry Eagleton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参见 Jacques Rancière, *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 Paris: La fabrique éditions, 2000, p. 12.